

中外名记者丛书

斯诺

尹均生/安 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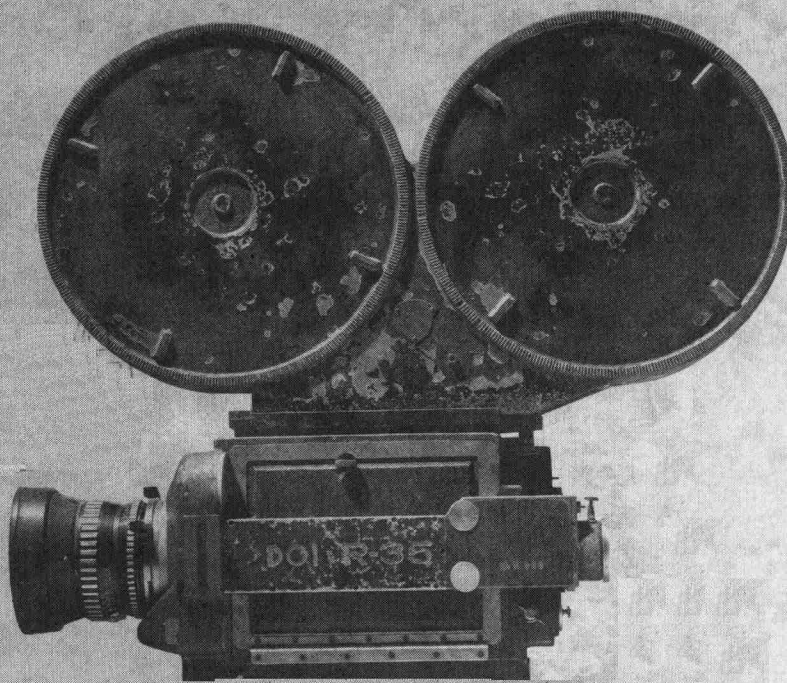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外名记者丛书

[美] 埃德加·斯诺

尹均生/安 危 著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诺/尹均生,安危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1

(中外名记者丛书)

ISBN 7-80002-818-6

I. 斯… II. ①尹…②安… III. ①斯诺, E. P. —评传②新闻—作品综合集—美国—现代 IV. K837.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7)第 05264 号

书 名: 中外名记者丛书——〔美〕埃德加·斯诺

著 者: 尹均生 安 危

责任编辑: 颜景政

出 版 者: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邮编:100733)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铁建印刷厂

字 数: 173 千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 875

印 数: 1—1000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02-818-6/G·240

定 价: 25. 80 元

编者的话

中国、外国都有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由于他们发表过大量成功的新闻作品，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探讨中外名记者成长的道路，借鉴他们在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培养我国新一代的名记者，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服务。

这套丛书的编辑体例是：每位名记者各占一本，每本 15 万字左右。前面是专家对他们的评传，后面是对其作品的精选。

目 录

人物评传	(1)
青少年时代:憧憬浪漫、梦幻和冒险	(1)
初到中国:在萨拉齐的人生觉醒	(5)
徘徊在中国:预言家和雅典娜	(13)
认识中国:与东方的两颗巨星相逢	(17)
《红星照耀中国》——“发现毛的哥伦布”	(31)
穿梭于欧亚非的“世界记者”	(44)
冷战烟云的岁月:伊实玛利在自己的祖国	(52)
一个圆满的历史结局	(59)
结束语	(65)
附录:斯诺在美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72)
作品选编	(79)
初到中国(1959 年)	(79)
中国的五大害(1928 年)	(87)
拯救二十五万条生命(1929 年)	(92)
中国洪水纪实(1931 年)	(105)
她为中国民众而战(1933 年)	(114)
白话大师鲁迅(1935 年)	(122)
《活的中国》序言(1936 年)	(132)
《红星照耀中国》节选(1937 年)	(137)
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137)
造反者	(141)
苏维埃强人	(147)
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154)
同红色农民谈话	(160)
红军战士的生活	(164)

别了,红色中国.....	(168)
红色的天际	(172)
生平年表及著作	(183)
后记	(185)

人物评传

斯诺的青年时期并没有什么可以表明他日后会成为杰出人物或是有争议的人物，但他所生长的环境和他年轻时的个性为他的一生撰写了意味深长的序言。

[美]约翰·汉密尔顿

青少年时代：憧憬浪漫、梦幻和冒险

1905年7月19日，埃德加·斯诺诞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个印刷厂主的家里，排行老三。这家人当时居住的房子如今仍坐落在默希尔大街381号。

斯诺的祖先从英格兰飘洋过海移居美国，住在东海岸的北卡罗来纳州。威廉·斯诺是他的第五代祖先，曾参加过美国的独立战争。斯诺自豪地声称，他的高祖塞缪尔·斯诺“在南北战争前就释放了他的全部奴隶”。由于埃德加·斯诺后来和中国的机缘，他坚持说，他的祖先包括马萨诸塞州的塞缪尔·斯诺船长曾被麦迪逊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广州的首任商业领事。

斯诺的父亲詹姆斯·埃德加·斯诺生于肯塔基州，为寻找工作到了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在那里遇到了美貌的安娜·埃德尔曼，于1899年6月和她结婚。斯诺认为，他出生在一个革命和动荡的世界中。他在自传中说：“我父亲和列宁及孙逸仙差不多同时出生，正是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十年光景；为镇压这场起义，四千万人头落地。多年以后，这三件事都给了我深刻影响。”斯诺的青年时期，他的故乡堪萨斯城正以惊人的速度从小城镇向工业化大城市挺进。当地商会把堪萨斯城称为“最美的城市”。到斯诺上中学的时候，这个州的制造业在全国名列第11位。在这种由乡村大草原向工业大城市的变迁中，他们的父辈们并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一切都靠自己的双手来实现。因此，堪萨斯市民们一直墨守密苏里农民的保守观念“眼见为实”。这句求实的谚语成为密苏里人性

格的标志。

埃德加·斯诺生活在一个不乏矛盾但却相当温暖、和谐的家庭里。父亲詹姆斯是共和党人，母亲安娜则是民主党人。但他们的分歧不在政见不同而在宗教信仰，詹姆斯打破基督教家规，娶了个信仰天主教的妻子。母亲要小斯诺到教堂做弥撒，父亲则给儿子读天主教禁书目录中的书。对此，母亲安娜做出了忍耐克制的榜样。斯诺后来说：“为了母亲的缘故，我在家时依然去做弥撒。”“我知道母亲善良而不自私，十分和蔼慈祥。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变成激烈的反天主教者”。在家中，斯诺的父亲并不粗俗，他穿戴整齐，带孩子们打网球，玩草地槌球游戏。他要求孩子们严守规矩，深深地爱着安娜，而当孩子们触犯规矩时，母亲总是出面求情，家庭气氛始终是融洽的。少年斯诺并不出众，学习成绩平常，他少年的好友怀特博士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富于想像，但有时又缺乏耐心的年轻人；他对于生活的向往是有传染性的；而且是一个不搞恶作剧的小淘气。”

少年斯诺，浪漫而自得其乐，他参加户外体育活动，参加各种俱乐部，在“鹰童子军”里获得12枚奖章。在中学时，他创办了一份兄弟会报纸《德塔》。他在中学里学习成绩平庸，于是他在自己高年级时的照片上题词：“要紧的是自尊。”升入初级大学的两个学期里，他的成绩是3个B，7个C（其中4个是英语课的）和植物学的1个F；他没有学完数学三角学。所以怀特博士后来幽默地说：“如果我早知道斯诺如今有这么大的名气，我或许能记忆得更清晰一些”。

虽然斯诺在感情上倾向于母亲，但在理想和人生道路上，却受到他父亲潜移默化的很大影响。詹姆斯作为一个印刷厂老板，在家里也是一个监工，他要求小埃德和哥哥都得劳动。上中学期间，斯诺就和别的男孩子一起在麦田干活儿，收割庄稼，在艰苦的劳动中，他每天磨破一双手套。红头发的小埃德经常吃力地提着父亲交办的成捆成捆的印刷品，送到大街上那幢厚实的红砖楼房里去，并在新闻编辑室里和那些记者们交谈。即使在读初级大学阶段，斯诺也在大学的报社里半工半读。所以斯诺在65岁同毛泽东谈话时，还说：“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经营印刷厂的詹姆斯并不是一个只知谋利的商人。他深知从

事印刷的人每天接触书面文字使他们有一扇通向文学作品的窗口。读大学的詹姆斯在随笔中写道：“当一个知道世界上所有主要图书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意图的学生走进图书馆时，他一生会感到自己是无比富有的！”当小埃德正在印刷所干活的时候，他父亲正在家中踱来踱去，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诵哈姆雷特在剧中的独白。斯诺后来回忆说：“每逢星期日下午，我都得听他朗读从那些被列为天主教禁书的英格索尔或勃朗德等人的著作中精心选择的章节。”他不得不承认：“我，父亲给我灌输了怀疑主义，使我对事物大都能抱理性主义的态度，厌恶任何形式的教条和专制主义。”斯诺在成人后显示出和父亲一样的性格特征，经过比较，作出独立的判断。在新闻采访中，认真获取真实的东西。为此，他从不遵循旅行时间表，甚至在与周恩来会面时，似乎他也下决心迟到。而且和詹姆斯一样，不为金钱妨害原则。（这是《斯诺传》的美国作者给他下的结论）

对斯诺影响的还有一个文化环境。他读小学时的诺曼小学的校长露西·斯穆特，是位注重孩子品德的严格教师。她写道：“学生们应认识到不诚实的行为和半途而废是最可耻的犯罪。”这个瘦削但精力充沛的妇女给斯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舅妈凯瑟琳·特丽萨·埃德尔曼，是一位当地的文学人物，她的诗歌定期刊登在詹姆斯承印的《堪萨斯城明星报》上。少年斯诺就接触记者和编辑，上大学后又做过《堪萨斯城明星报》的兼职住校记者。他回忆说：“报馆的工作间就像一颗伟大的跳动着的心脏……我从远处怀着敬意望着那些编辑们。”这些无疑是他日后成为一位求实的新闻记者心灵上的深深印痕。

斯诺爱好旅行和冒险，这除了从他移民祖先继承了好流动的天性之外，就是马克·吐温的作品影响了他。他读了《哈克贝利·芬历险记》（1985）、《汤姆·索耶历险记》和《密西西比河上》和其他著作。所以，斯诺的朋友们后采开玩笑说：“他是一边读着马克·吐温的书一边被生下来的。”堪萨斯城郊外的小水坑如何能满足小埃德对大河的向往？1922年，斯诺同少年好友查尔斯·怀特、鲍勃·朗，乘了朗家里的黑色T型游览车，向加里福尼亚进发，三个月后，花完了五美元钱，只好同怀特回堪萨斯去。他们没有钱留恋那浩瀚的大海、葱郁的亚热带森林和陡峭的山峦，也没有回家的车费。他们扒乘货车，爬行客车顶上穿越低狭的隧道；他们被警察逮住又被

警察追赶；他们躺在平板货车厢里尽情地晒太阳。随着轰隆行驶的列车，跨越了举世闻名的、山峦叠嶂的罗亚尔·乔治大峡谷。更重要的是，他们看见了罢工，经历了劫匪的袭击，看到食品因运输停顿而涨价……外面的世界并不是那么充满浪漫和梦幻。斯诺高兴地是；这种艰难的冒险旅行，使他遇见了普通人民，以及他在晚年仍经常缅怀的大洋彼岸的珍奇世界。

1925年秋天，斯诺回到密苏里，进了密苏里大学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创建于1908年。他的创始人迪安·沃尔特·威廉斯，在斯诺出生前就组织过多次国际性的新闻会议，成立了世界新闻学会，并把许多有才华的年轻毕业生派到国外的工作岗位上。学院的这一传统对斯诺自然有极大的诱惑力。在学院，他潜心攻读新闻课程，他获得了比初级大学好得多的成绩，这为他后来的职业打下了基础。而且在这里交了朋友，建立了日后重要的联系。

1926年，斯诺离开密苏里来到纽约。这座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大都会，充满了广告、股票之类闪烁诱人光彩的机遇。但诚实的埃德不是爱虚荣和自负的人。他没有模仿沃尔特·李普曼的派头，头戴高帽、手持拐杖进入纽约。人们见到的还是那个红色头发的密苏里小伙子。他在这里结交了一个重要朋友，就是在纽约多家报刊当编辑、记者的查尔斯·汉尼·汤先生。汤利用他的关系安排了斯诺出国旅行向国内发送新闻的渠道，并同意让斯诺做他的代理人。1927年下半年，斯诺受雇于雷德诺号轮船当一名舱面水手，每月工资25美元，这条货船将经巴拿马、夏威夷、菲律宾、中国到印度。

美国正在走向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斯诺却没有留在家乡。“他已经用马克·吐温的农业美国式的幻想武装起来了，他一定要去见见大世面。”

人是盘根错节的关系之综合，世界即其花朵和果实。

——埃默森

初到中国：在萨拉齐的人生觉醒

1. 走到一起的三个密苏里人

1928年2月15日，23岁的埃德加·斯诺在没有告知家人的情况下，受雇于罗斯福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克米特·罗斯福，登上了前往远东的“雷德诺号”。两天以后，他才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向家人宣布了他“周游世界”的梦想。信的大意如下：

亲爱的父母：

你们这个不值钱儿子现在是“雷德诺号”轮船上的一名水手啦！

请你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草率而匆忙的举动……很久以来，我就有周游世界各地那些更为有趣的国家的强烈愿望。……对我来说，有趣的生活、快乐的日子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旅行！冒险！经历！……我决定冲破那些把我束缚在买卖和生意圈子里的绳网，尽快奔向大海。（以上为2月17日写）

我的这次旅行需要9个月的时间……到上海后，我将离开雷德诺号去漫游和跋涉。……

爱你们的儿子 埃德加

1928年2月22日

30年以后（1958年），斯诺在《复始之旅》中对自己这次漫游的动机做了更明确的阐述：

当时，我本来有可能成为同代人中的普通一员，像我的祖先一样，在开发边疆的梦想驱使和不可名状的自由的召唤下，如同日落后的一颗“坠星”，去西部寻求财富，探索知识。

那年我22岁，在华尔街的投机中赚了几个钱。我想，这点钱省吃俭用也够我一年到世界各地冒险一番了。我计划一年后返回纽约。30岁以前赚一笔钱，后半辈子就可以悠闲地搞

点研究和写作了。

这位年轻的密苏里小伙子的远东之行，并没有摆脱那浪漫的稚气幻想。他仅仅是为冒险而冒险，并没有既定的远大目标。在轮船上，这个留起小胡子的青年人站哨，轮班掌舵。他说：“我曾劝说伙伴在通过巴拿马运河时让我掌一段路的舵，只是为了体验一下那种惊险感。”这时，他脑海里显现出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所描写的一位水手，竟然在梦游中掌舵通过大河的险滩那段故事。

雷德诺号的航程是，从巴拿马、夏威夷到远东。但这条船因锅炉爆炸而停航。无钱买回程船票的斯诺，在送友人丹·克拉布乘西尼奥丸赴日本时，竟和朋友合谋了一个偷乘计划，混上了西尼奥丸。当轮船将在横滨靠岸时，斯诺因无登陆卡而会去坐牢。这次在一名英国记者的掩护下，对海关人员点头、挥手，冒充记者到了东京。在日本期间，斯诺将他从西尼奥丸逃脱的冒险经历写成文章交给美国人办的《日本广告报》。让他和克拉布离开日本后再发表。他游览了横滨、富士、名古屋、京都，然后从神户乘“亚洲女皇号”，向中国驶去。1928年7月6日，埃德抵达上海。

30年代的上海，被西方资产阶级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年轻的斯诺睁大那双好奇的眼睛。他领略过夏威夷的美丽和日本的妩媚之后，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这座熙熙攘攘的东方商城，一面是挂着金字招牌、琳琅满目的绸缎店铺，弥漫着浓烈鸦片香味的街道。白人绅士带着夫人或俄国情妇去外滩乘凉；珠光宝气、裸露大腿的中国太太招摇过市。另一面是光脊梁虎背熊腰不停奔跑的人力车夫，灯光通明的剧院充斥着身段丰满的供富商淫乐的少女；无数乞丐带着他们赤身裸体、肮脏的孩子们在苦苦哀求。迷人的黄浦江上布满外国军舰，大片宁静的公共租界上耸立着有气派的宅邸和大草坪，餐馆、酒吧、俱乐部都是供高等民族享用的，中国人除了当听差是不准进入这些地方的。

“这就是上海！”斯诺坦诚地写道：“各国来投机的人吵吵嚷嚷地操着不同的语言，人们直言不讳地宣称金钱就是一切，这种俗不可耐的现象使我感到迷惑诧异。”

斯诺到上海后住在四川路海军基督教青年会。他来到爱多利亚路4号的大北电报公司大楼第6层，走进了《密勒氏评论报》的办

公室。斯诺向这家报的主编鲍威尔递交了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的介绍信。鲍威尔生于密苏里并在那里长大,《密勒氏评论报》的创始人密勒也是密苏里人,碰巧也在密苏里大学毕业,现在成了“东方美国新闻记者的老前辈”。三个密苏里人走到一起了,这真是上天的安排。

密勒憎恨帝国主义殖民行径,但却亲蒋介石政权;鲍威尔 1922 年接办《密勒氏评论报》,也同密勒的倾向一样,他们都对共产主义没有好感,初来乍到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斯诺在这方面当然受到他们的影响。斯诺后来回忆说:“《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方针是坚决反共,同时坚决反帝。……鲍威尔是蒋介石的热心崇拜者,从一开始就支持蒋介石,把他看作反对旧北京政府的国民革命领袖。”然而,正是斯诺来到上海的前一年,蒋介石实行“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屠杀了五千名共产党人和工人。斯诺坦率地承认自己当时并不能正确认识这件大事。他说:“在 30 年代,我们这些外国人和体面的中国人都感到杜(月笙)先生和蒋先生从‘暴民’手里拯救了中国。在跟商人鲍威尔谈起这件事时,我曾认为牺牲是必要的,《密勒氏评论报》的方针是正确的。”支持蒋介石的鲍威尔打算编一期《新中国》特刊,颂扬蒋的“国家统一”,证明“革命已经过去”。鲍威尔选中斯诺作他的助手。于是他们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在这期间,斯诺如同牛进了菜园子一样,如饥似渴地在鲍威尔图书馆内啃那些堆到天花板的中国图书,专心致志地听这位老师讲述中国的一切。这为他以后写关于中国的著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8 年 10 月,鲍威尔派斯诺前往国民党首都南京采访,他和蒋介石握过手,会见了政府的部长宋子文、孙科等。南京之行前后,在他署名发表的文章中,乐观地认为“有一种精神,或者至少有一种看起来很有希望的精神,‘把中国从泥淖之中救出来’,”他并预言:50 年后的中国将会如何如何地繁荣。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还没有学会怎样观察实际情况,这种浪漫主义的热情说明了他的幼稚和少知。

10 天的南京到济南之行后,斯诺接受鲍威尔的第二次指派,沿中国铁路线观察风景名胜。陪同他的是铁道部技术专家,留美学生“华盛顿·吴。”旅游了三个月的风景名胜之后。斯诺不顾吴的反对,坚决开始了对他的一生有重大意义的绥远之行。

2. 苦难的大地和心灵的觉醒

斯诺的绥远之行，还受到国民党交通部长孙科的赞助。孙科对斯诺说：“既然赤色分子已被镇压，就没有什么排外主义了。革命已经过去，国家已经统一。你将看到，人民多么和平友善。你就如实报道吧。”斯诺由一位自称副部长级的专家吴作陪同，享受着当时最为舒适的待遇，开始在中国八千英里的铁路线上旅行。

斯诺从南京到哈尔滨，从北京到长城内外，写了不少游记，供《密勒氏评论报》连载。在长江上下游，那太湖岛屿的芳草萋萋和岸边碧绿的桑田；杭州西湖的佛寺与宝塔；河汉交错，以游船画舫和美女闻名的苏州；中山陵所在地南京雄伟的紫金山。在北方，有孔子诞生地的泰山；尤其是北京，那“金碧辉煌的屋顶，汉白玉祭坛，紫红色的城墙，绿树掩映的庙宇和宫殿，挺拔高耸的刺槐和美丽的街景。”对于远涉重洋、旅游成癖的美国新闻学院出身的职业记者，描写这样的风景线，真可说是游刃有余了。

但，这就是中国吗？

在上海时，斯诺就听不少欧洲人说：中国西北有着“所谓的饥荒。”中国原西北地区面积比得克萨斯州还大，这无疑吸引了好奇的斯诺。绥远是当时中国铁路的北边尽头。华盛顿·吴要在张家口结束京绥铁路上的旅行。斯诺说他的任务是奉命考察所有的铁路线，坚持要去绥远。这位吴是“中国官场千千万万食客中的一个”，对铁路事务一窍不通，沿途大嚼鱼翅，掏下级官员的腰包，在旅店调戏少女……哪肯到灾区受苦？！但在斯诺坚持下，只好加挂一节特别车厢开往绥远。

1929年6月的一天，车出张家口，在残破的货车厢里，挤满半裸身体的小孩，几乎全是女的，面带饥色，一问，原来是被人贩子运往工场或妓院的。在一个小站上，斯诺遇上了日后的终身好友、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是英国工部局的工厂视察，利用假期去灾区办施粥所，修筑灌溉渠。第二天火车便到了铁路的终点萨拉齐。

萨拉齐是蒙语译音，意为“务奶食者”。在明朝时，这里是专为阿拉埋汗家族提供奶食的地方。这里依山傍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人民善良勤劳，应该是老百姓安居乐业之处。

但是，一路上，斯诺所见是：“满目凄凉，全无生机，就像是刚刚发生过一场火山爆发，甚至树也剥光了皮，还在枯萎下去。”

斯诺走在萨拉齐死气沉沉的大街上。作为新闻记者,他知道世界各地报道了中国西北几省的大饥荒。从1924年起,干旱无雨。据华洋义赈会估计,甘、陕、豫、晋、绥远和新疆大约有2500万人处于饥饿线上。他看见萨拉齐“街道两旁挤满快要饿死的男女老幼,他们有的坐在房屋的门口,有的坐在街边石上,有的坐在残垣断壁上,有的无力地躺在小沟里。”“他们手里攥着小木碗、空罐头盒或破旧的茶壶,等待救世军的施粥棚开门”。“他们身上的几乎每一块骨头和每一根青筋都明显地突起……一个人只有这么一点肉贴在骨架上而居然能活下来,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新闻记者的职业和他内心的人类感情,使他不得不抑制自己,不停地给饥民拍照,并在小黑皮本上做笔记。他写道:我们在另一个地方看到了我一生中未曾见过的最令人心悸的场面,一个不到6岁的男孩,一身灰垢;用他那瘦小而又扭曲了的身体内的全部力气,去推动一个老人的躯体,拼命地叫喊父亲。斯诺走过去摸了摸老人的脉搏,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斯诺遇到两位年轻妇女,她们衣不蔽体,身体干瘦,干瘪的乳房像空纸袋一样垂于胸前昏倒在村里的大路上。斯诺和他的朋友把她们送到难民营。

在一所寺院的大门口,一个衣着破烂、纹丝不动的人引起斯诺的注意。她显然是一个母亲,怀里有个搐动着身子,嗷嗷待哺的婴儿。她手指关节肿胀,任一团苍蝇在她的破衣烂衫中钻进钻出。斯诺心头抽紧,无法自抑。他走过去将两块银元塞进她手中。并摇摇她,指了指银元。但那位妇女“看看我,又看看银元,最后摇了摇头,将银元紧紧攥在手里,转过脸去避开直射的阳光。”显然,她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了。

在萨拉齐和附近小镇的调查采访,耳闻目睹,眼见为实。斯诺忧心如焚,刺激难消,怀着极为痛心而复杂的感情。

1927年7月4日,斯诺返回到绥远城。立即提笔写了长篇特写《拯救二十五万生灵》。他激情难抑,思如泉涌,一开头便写道:

“瞧眼前这幅情景,”我愤愤地说,“但是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人居然说这是‘所谓的饥荒’!”

为了使他的报道具有确证性,他把陪同他一道采访的华洋义赈会救灾的奥·托·托德先生和英格拉姆医生都写进了报道,作为目击者的见证。《密勒氏评论报》于1929年8月3日予以发表。这

篇报道完全不同于他前不久所写的那些“大开眼界和心旷神怡的”旅游文章了。他说，“来到了北京以西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地带”，他看到了中国更为真实的那一面。现实生活是一个严格的教师。那个立志游历世界的年轻记者将要从事社会学、道德学、人类学的更宽广的视角来认识他面前的社会，要站在异国人民的角度来思考未来了。

在斯诺自己写的回忆性文章中，他是非常重视这次萨拉齐之行的。1936年，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

我当时23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恶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1958年，斯诺在《复始之旅》中再次写道：

我到了戈壁滩南面的火城萨拉齐。在中国西北那个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万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

美国的斯诺传记的作者对此似乎轻轻带过，他们没有认真地注意到斯诺后半生对自己人生旅程所作的这个结论性的提示。如果说每一个人在毕生经历中都有若干泾渭分明的阶段的话，萨拉齐之行无疑是斯诺的人生阶段的一个重要界限。

难得的是，斯诺完全不同于欧美那些殖民者、冒险家、投机商；也不同于带有种族偏见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某些西方知识分子。他为人诚朴，谦逊好学，尊重事实，富有人类同情心。他从不把自己当作救世“布道者”或“洋钦差”。他是一位坦率的新闻记者，一个有强烈正义感的西方文化人。对人民；他笃信基督“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条，充满了体恤、尊重、爱护和关切。

面对满目疮痍，穷困和绝望。他想：“如果我有很多钱就好了，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产生这种念头。我渴望有钱帮助那些麇集在我周围的人们，洗去他们灼热的目光中绝望的神情。”但是，他接着写道：“他们没有乞讨，甚至连瘦骨嶙刚的孩童也没有跟在我身后讨一个铜板。……或许这件事最能说明这里人民的坚忍精神，所以它给我的印象极深。”“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有朝一日像这些人一样濒于死亡，我们一定会央求上帝赶快把我们带走。但是

对这些中国人来说,那样的态度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是至死不屈的人。”正是这些既忠于客观现实又坦诚剖白自己的内心世界,把客观事物和主观感受融为一体的报道方法,创造了三十年代世界报告文学的崭新风格,深深烙印在读者的心灵。

对受难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敬重与爱,激起了斯诺富于同情的天性,乃至产生了拯救他们于水火的愿望。这是斯诺思想上的一个大转折。“为什么我开始觉得中国有了重要性了呢?……我的童年的生活是何等地不同,作为一个富裕的、开放的和新开发的文明社会的一员,比起旧中国生计艰难的人们,我的机遇不知好了多少倍,大自然是慷慨大度的,人们只要劳动就可以得到报偿。而在有数千年人剥削人的历史的旧中国,最严重的弱肉强食的争斗还要继续下去。”这是斯诺后来回忆那次感触写下的真情记录。

斯诺在萨拉齐所看到的饥荒,以及某些外国人和国民党政府对西北大饥荒的态度,引起了他的愤怒。他写道:“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常说:‘这些中国人没有心肝,他们卖掉一个孩子就像是卖掉一头猪一样’。”对这样的指责。斯诺反驳说:“在一个外国租界,仅1930年就草草埋葬了二万八千具尸体,而且大多是婴儿。这怎么解释?!另外一些外国人则说:中国西北是‘所谓的饥荒’”。斯诺在写萨拉齐饥荒的那篇报道的末尾愤愤不平地说:在上海竟然有这样一些外国人,他们继续把中国大西北的灾难说成是“所谓的饥荒”,甚至还写信给其国内的朋友,要他们不要受“饥荒”宣传的欺骗。

对于面积为二千万人的大饥荒。斯诺说,这是需要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给予援助的。但国民党政府却袖手不管。参加救灾的英格拉姆医生对斯诺说:“当官的什么也不管,真可耻!他们整天忙于通过决议,因人设事为熟人安排新差事。”可能是鉴于斯诺还得在中国采访的原因,他没有写出这一切。但在后来自传性的回忆中,他毫不客气地写道:当时的西北政权,实际掌握在阎锡山、冯玉祥两个人手中,“蒋委员长这时对他们两个都不信任,把饥荒看作是迫使他们就范的有效武器。南京没有给饥饿的人们送去粮食。华洋义赈会用私人捐款购得少许粮食,但政府甚至不给车皮。”

据此,我们可以分析,斯诺所说的“觉醒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与挚爱;摆脱了西方某些殖民者意识的影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幻想开始动摇乃至产生破灭。